

电视媒介的政治参与功能及特点

戴冰洁

摘要：媒介已成为影响基层民主政治的新变量。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介在政治参与方面具有宣传教育、示范参照、议程设置、环境监督等功能，体现出社会化和个性化的统一、主导性和受动性的统一、持续性与循环性的统一等特点。电视媒介正日益成为推进当代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有效力量。

关键词：政治参与；电视媒介；基层民主

作者简介：戴冰洁，女，讲师，社会学硕士。（浙江传媒学院 社会科学部，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8-6552(2010)03-0056-04

当前，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推进和鼓励民众政治参与的信息传播也不断引发并重整着个人、集体和地区之间的利益分殊与冲突。公众传播和社会媒介对在各种政治文化间矛盾徘徊的公民群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和影响也越来越大。如此，“媒介作用”日益成为嵌入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参与过程的新变量，突出影响着我国广大社会民众的政治参与过程。其中，电视媒介凭借其受众多、覆盖广、影响大、社会效益显著的优势，为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推波助澜，正日益成为发展基层民主政治的有利载体和宣传平台。

当媒介遭遇政治参与，前者在独特的政治场域中会有何种演绎与表现？本文拟以电视为例，结合政治参与的四个维度，即作为发动者的上级政府、作为被发动者和参与主体的普通社会民众、作为基层民主政治核心的民主程序以及基层民主政治的实践行为，对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介在民众政治参与方面的影响与特点进行思考。

一、宣传教育功能：体现为政治意识社会化和个体学习个性化的统一

所谓电视媒介的宣传教育功能是指电视媒介为政府贯彻国家意图、普及国家意识提供宣传支持，为民众了解民生、学习政治资讯提供信息保障。

信息在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普及中占据决定性的地位。社会民众对相关政策法规、背景程序、政治参与技巧的把握和熟练程度直接影响着一国的政治民主化程度。在传统时代，社会民众对国家意图和国家意识的接受途径单一，主要通过至上而下的动员和逐级传达来实现。在信息日益普及、大众化的时代，电视媒介在政府传递政府意愿、社会民众接受政府讯息方面日益发挥主要渠道作用。

一方面，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朝闻天下”、“午间新闻”、“中国新闻报道”、“海峡两岸”等栏目成为基层社会民众了解民主政治信息的主要平台。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有意把此类电视栏目作为宣传民主政治、普及政治参与的有利途径着力强化，并通过常态的固定时段的播出便捷、及时地传递国家意识；同时，社会民众信赖这些权威媒介的公信力，愿意并能够以此类栏目为窗口了解当下中国民主政治的政策背景、相关法规，理解不断发生的民主事件。在笔者的无结构访谈中，100%的被调查者都把电视作为自己获取政治信息的主要途径。“新闻联播”及“中国新闻”等类似节目已成为民众接收政治讯息的主要窗口。

另一方面，各省级电视台、市级新闻综合台、市级民生休闲台等栏目也成为各省市政府和社

众进行政治信息沟通和交流的有效平台。基层社会民众从中获取与自己切身相关的所在行政区域范围内的政策信息、法律法规以及鲜活的群众参与案例作为日常生活的参考和借鉴。以浙江省为例，关注百姓维权，关注民生大计的本地方言民生类栏目在近几年大有异军突起之势。温州经济科教频道的“百晓说新闻”、杭州西湖明珠频道“阿六头说新闻”等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方言栏目和浙江民生休闲频道的“1818黄金眼”等百姓民生专栏大受追捧，尤其成为地方文化水平较低、普通话掌握程度较差的中老年族群了解社会动态的热门视窗。

由此可见，电视媒体作为普通社会民众获取国家政策法规、学习并观摩政治参与实践、内化政治观念方面的主导力量，已是不争的事实。美国、英国等国家的政治实践也表明，正因为认识到电视媒介这种信息主导作用，国家或地区领导人电视演说、候选人电视辩论、口水政治等形式的栏目才会应运而生并大受社会民众欢迎，同时也使得电视越来越成为获取政治信息、参与政治活动的主要窗口和平台。由此，电视媒介影响下的民众政治参与过程表现为政治意识社会化和个体学习个性化的统一。

二、示范参照功能：体现为电视媒介主导性和社会民众受动性的统一

所谓电视媒介的示范参照功能是指电视媒介为基层民主政治培养潜在的参与群体，并通过民众对于电视媒介相关政治参与报道的参照内化进一步强化其政治认知与习惯。

政治参与是一个兼具理论与实践双重价值的概念。民众的政治参与，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民众不断接受政治教育、进行政治模仿、尝试政治实践的一个循环过程。如果说上文所提到的电视媒介为政府贯彻国家意图，普及国家意识提供宣传支持的作用是一个政治教育过程的话，民众的政治实践活动也是以电视媒介所提供的各种鲜活的政治事例为参照模仿的对象、不断内化的结果。

徐勇教授在论及“村民自治”对我国民主政治体制的影响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村民自治是一种民主实验，通过让基层社会民众进行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等实践活动，可以让民众逐渐养成民主习惯、习得民主程序、掌握民主技巧，从而最终实现我国的政治民主。按照徐教授的观点，把占中国人口80%多的农村人口的民主习惯培养好了，无疑是对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极大推进。这里强调的就是政治模仿和政治实践对培养民主意识、推进政治民主的作用。笔者认为，电视媒介和村民自治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村民自治是指村民依照法律和本村实际情况在实践中尝试自我管理，学习民主治理，这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单向单一的。电视媒介则通过信息技术，将发生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里的政治事例在同一时空加以呈现，这种民主的实践和锻炼形式是立体、多元的、也是更具全面性的。当代青年族群于电视媒介中播放的同类政治事件进行的迁移性学习对于其政治观点形成、政治能力养成的作用越来越大。这是身处电视传播时代人们的切身感受，而与此相关的研究也正在引起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界的普遍关注。每年我国的电视媒介都会在“两会”、国庆等重大政治仪式时刻不遗余力地向民众直播、重播现场实况。换言之，在发生机制上，电视媒介正以一种非直接的对话，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民众的政治理解。

电视媒介潜移默化的节目编排中传递着政治参与的时代之意，并通过民众的“内化”成为社会民众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民主习惯、民主技巧等。由此，电视媒介影响下的民众政治参与过程表现为电视媒介主导性和社会民众受动性的统一。

三、议程设置功能：体现为社会发展持续性与个体行为循环性的统一

议程设置功能，就是指媒介的这样一种能力：“通过反复播出某类新闻报道，强化该话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1]该思想的前驱李普曼在1922年的著作《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一书中指出：“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1]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en）在1963年关于报刊业威力的论断更是被后人广泛引用，他说：“在多数时候，报界在告诉人们该怎么想时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想些什么时，却是惊人地成功。”^[2]

196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麦考姆斯和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查佩尔希尔地区通过实证办法对上述思想进行了探测性研究。他们的结论是:“大众媒介对不同竞选议题的强调程度,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竞选者对重要议题的强调程度,而且也与选民对各种竞选议题重要性的判断之间,存在极高的相关性。”^[3]“换言之,大众媒介创造了选民头脑中关于外在世界的图象(Shearon A. Lowery & Melvin L. De Fleur, 1988)”^[4]

本文所谓电视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专指电视媒介以其独特的发生机制将国家议程转变为媒介议程,最终以民众认同内化的方式成为公众议程,并对民众政治参与绩效起检验与鞭策作用。

以电视为代表的后起媒介以其突出的易用性、可视性、互动性以及内容的丰富性等优势,迅速取代了传统广播、期刊和报纸的舆论主导地位,更因其今日在中国农村的普及现状而成为影响当代中国基层民主政治进程、主导民众政治参与方向的最主要途径。以新中国60周年国庆为例,“十一”国庆前后,从中央电视台到各省市电视台的电视节目安排上,纪念、回顾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各类新闻综艺节目占据了此类节目总量的半数以上,市级以上电视台的综艺节目大部分也是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红色经典”作品。此外,反应不同历史时期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为新中国建设与改革事业所做出的丰功伟绩的“献礼”作品一时间也层出不穷,从《建国大业》、《天安门》、《风声》等电影作品(包括其宣传报道新闻),再到《解放》、《东方红》、《暗战》等电视连续剧,弘扬主旋律,歌颂爱国热情成为了不同节目形式的电视媒介不约而同的节目所向。“十一”国庆盛典仪式期间,电视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更是发挥到极致,几乎100%的市级以上电视台都在直播甚至反复重播国庆阅兵盛典。在电视媒介这样的“狂轰滥炸”之下,国人一时之间所有的关注点都投在了国家话语所主导的“国庆典礼”上,国庆当天的阅兵典礼收视率更是创下历史新高。以此类推,不难发现在之前的奥运会等类似的国家重大历史时刻,电视媒介的话语同样是集中而有力的。这在另一个侧面也反应出电视媒介对于社会民众思想内容的巨大设置与导向作用。

而在更多的普通时段,电视媒介在提供娱乐休闲、舆论导向、树立榜样等方面的作用相对更加明显。政治参与和民主进程作为国家意志的“国家议程”,自然而然会成为电视媒介趋之若鹜的“媒介议程”,并通过各类节目进入社会民众的思想视野,逐渐内化为社会民众普遍认可的“公众议程”。

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的“民主意识”已经伴随着中国村民自治的30年进程而有了普遍的群众基础,可以预料的是伴随着电视媒介对社会民众政治民主议程的有效而不断的设置,我国社会民众的政治参与过程必将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和现实意义,从而为社会民众的政治参与不断提供新动力,实现我国社会政治体系的健康延续和良性运行。

从传播学意义上来讲,媒介传播在提供休闲娱乐、舆论导向、树立榜样等作用的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监督环境。这也是电视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上更优于传统报刊等传播媒介的方面。观众经常可以在电视上看到针砭时弊、弘扬正气的各类节目,从新闻访谈类节目到影视剧作品,都是通过“邪不胜正”、“真理必将胜利”、“民主政治是我国的发展之路”等共同的叙事模式来检验和鞭策民众的政治参与过程,使得观众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民主正义的“标准化”教育,及时对照自己的政治参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电视媒介这种监督环境、检验和鞭策民众政治参与的功能从根本上提供给社会整体政治系统以健康、有序的发展保障,并推动着民众接受政治教育、进行政治模仿、体验政治实践的过程以一种良性的循环模式向前发展。由此,电视媒介影响下的民众政治参与过程表现为社会发展持续性与个体行为循环性的统一。

四、思考与讨论

综上对政治参与微观主体的分析,电视媒介对基层民主政治环节中的政府、群众、民主程序、民主实践都有着重大影响,对社会民众政治参与进程的推进作用突出,社会影响显著。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民众的政治参与过程又表现为社会化与个性化相统一、主导性与受动性相统一、持续性与循环性

相统一的特点，因而在推进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提高社会民众民主政治意识和能力的过程中，就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一）电视媒介必须牢牢把握国家政治大方向，在正确解读国家意图的基础上进行政治宣传和议程设置。政治参与的首要前提是必须通过政治文化的教育、政治习惯的养成和政治能力的锻炼最终把民众从原先对政治文化一无所知的“政治自然人”培养成为熟练掌握社会政治文化和政治活动规则的“政治社会人”，从而适应社会的政治发展。因而电视媒介必须把牢牢把握国家政治方向，正确解读国家意图作为自己策划和编排节目的前提与基础。只有如此才能对社会民众的政治参与过程起到积极的正面的引导作用，而不是相反。在江浙沪等我国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民众的意识更为开放和活跃，这些情况尤其需要强有力的媒介导向。

（二）节目形式应多元生动，改变“填鸭式”的单向灌输，积极开拓社会民众与电视节目的互动平台。政治参与的原则必须是民主平等。而在日常的电视节目中，能人或能人团体的“话语强势”、“话语霸权”现象却依然严重。根据笔者对浙江杭州、金华、温州等地区村庄的调查，“能人村治”作为主要的基层民主政治模式^[5]，对政治参与视角下的媒介作用的认识往往呈单向思维，“能人话语”强势。政府及基层工作人员长期只注意到电视媒介自上而下的宣传动员作用，导致了电视媒介在相当长时间里的单向思维，一厢情愿，社会民众容易产生逆反心理，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电视媒介工作者和相关部门的领导者必须看到民主、自由的言论氛围是民主政治的题中之义。政治参与的过程必须体现社会民众自己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单一、僵化的电视媒介只会培养出呆板而没有创新意识的“政治机器人”。

（三）社会民众应自觉加强信息辨别能力，实现民众政治参与的有效健康发展。政治参与的过程应是社会与民众之间不断的互动，由作为政治信息传播的“教”和作为民众的政治学习的“化”共同组成。因而社会民众必须在接受电视媒介宣传教育、议程设置和环境监督的同时，自觉发挥主动性和能动性，提高信息辨别的能力。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政治参与的内在和形式的统一、电视媒介主导性和社会民众能动性的统一。

（四）国家应善用电视媒介的力量，积极构建国家—电视—社会民众良性互动新模式。

在共和国60年里的发展历程中，电视媒介对社会民众政治参与的影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并日益承担起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喉舌的重要作用。这个作用国家民族需要，社会民众需要，电视媒介出于自身的生存发展同样也需要。因而，如何构建起国家—（电视）媒介—民众三元的良性互动模式就成为摆着政府、媒介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也是每一个合格的政治社会人必须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李本乾，张国良．中国受众与大众传媒议程设置功能研究[J]．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115.
- [2] [美] 沃纳·塞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第四版）[M]．郭镇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54.
- [3] Maxwell E. McCombs & Donald. Shaw, (1972) . The Agenda - 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76.
- [4] Shearon A. Lowery & Melvin L. De Fleur, (1988) . Mileston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Longman Publishing Group, New York, 58.
- [5] 戴冰洁．能人型村庄治理模式的权力结构分析[J]．理论观察，2009（3），106.